

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张莹 鲍丙朋 符大海

摘要：加强公司治理能否促进企业高质量出口？回答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从微观层次理解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利用 2009—2015 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出口统计匹配数据，以 2012 年关于中国主板上市公司“内控通知”的出台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并识别了内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该促进效应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更为明显。机制检验显示，加强公司内部治理主要通过提高研发强度、提升生产率和降低融资约束这三条途径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拓展分析中，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在推动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层面的积极意义。本文不仅拓展了有关加强公司治理的经济效应研究，也丰富了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对进一步从微观企业层面推动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出口产品质量；高质量出口

[中图分类号] F74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5) 04-0108-17

DOI:10.13510/j.cnki.jit.2025.04.003

引言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充分发挥要素禀赋优势，通过制度开放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 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达到了 33 638.35 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为 14.99%，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时的 12.64 倍。从增长率来看，自 2001 年到 2021 年，中国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 14.11%，远超全球出口额平均增长

[收稿日期] 2024-12-01

[基金项目] 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20210033）

[作者信息] 张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鲍丙朋（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信箱 baobingpeng@163.com；符大海：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速度 6.85%。在此期间,中国货物出口额自 2009 年起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一跃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贸易大国”。然而,我国对外贸易仍然“大而不强”,数量扩张型的出口模式面临创新能力不足、产品质量提升缓慢、自主知名品牌少等问题。同时,近年来,我国的内部发展面临劳动力红利衰弱、资源环境约束严峻等问题。因此,在外部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与发展中国家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成为了我国新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向。

内部控制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出口提供了重要动力。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陈红等,2018)^[1]。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一种治理方式,旨在实现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等控制性目标。已有研究表明,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内部控制在优化或提升公司内部管理体系、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优化部门协调效率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钟凯等,2016)^[2],这均有助于企业实现生产经营绩效的提升。而作为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载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等贸易优势的出现均需要依托于企业高质量的生产经营活动。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可能通过提升效率水平、增强研发投入及环境融资约束等多个途径,助力企业高质量出口。因此,值得关注的是,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除了在企业日常决策和运营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能否进一步对企业高质量出口产生影响?从现有研究来看,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在企业生产经营绩效方面的经济效应已经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尚未有文献探讨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特别是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机制有待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科学回答公司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不仅能够为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微观证据,而且对于推进企业出口升级、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首先以财政部与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 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以下简称“内控通知”)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而后,本文尝试阐述上述的结论是否存在企业所属地区、企业出口目的国和所属行业的异质性。进一步,文章从研发强度渠道、生产率渠道和融资约束渠道探讨上述影响的内在机制。最后,本文探究了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如何影响出口的二元边际。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本文聚焦在公司治理视角,首次讨论了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在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相较于已有文献从企业外部讨论,本文更加关注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在推动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企业内部运行机理;另一方面,相较于已有文献从企业内部讨论,本文首次引入“内控通知”这一准自然实验,相对生地厘清了加强公司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不仅为我国对

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视角,也为制度影响贸易这一支前沿文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第二,本文揭示了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即甄别了研发强度增加、生产率提高、融资约束降低三种影响渠道。这不仅厘清了加强公司治理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为企业实现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并为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内部控制的经济效应和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因素。

(一) 内部控制的经济效应

依据内部控制的目标,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信息透明度和企业绩效两个视角阐述。

1. 信息透明度与企业风险

现有研究发现,加强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提升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稳健性(Doyle et al., 2007)^[3]。如财务报告审计将有效推动管理层关注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有利于提升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方红星和金玉娜, 2013)^[4],进而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运营成本。从机制上看,一是内部控制带来的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的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和盈利能力更差的公司中更显著(叶康涛等, 2015)^[5];二是内部控制的建设降低了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Dhaliwal et al., 2011)^[6];三是内部控制的建设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违规水平,降低企业风险(单华军, 2010^[7];Bargeron et al., 2010^[8])。

2. 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

内部控制是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管理质量的重要途径(张国清和马威伟, 2020)^[9],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内部控制的建设能够有效抑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进而有效抑制企业盲目扩张带来的财务困境(余明桂等, 2006)^[10];(2)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控制关联交易行为,从而防止股东对资金的占用(杨德明等, 2009^[11]; Brochet, 2010^[12]);(3)内部控制建设能促使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秦娜和曾祥飞, 2018)^[13];(4)在企业生产效率方面,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郭檬楠和李校红, 2020)^[14]。

(二) 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因素

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是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现有文献已经从多个视角阐述了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影响因素。

1. 出口产品质量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出持续提升的态势是多数研究的共识(施炳展, 2014)^[15]。现有文献分别从企业内外两个视角来研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企业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中间品进口(许家云等, 2017)^[16]、生产率

(樊海潮和郭光远, 2015)^[17] 和研发投入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18] 等。企业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贸易自由化 (Fan et al., 2015)^[19]、外商直接投资 (李坤望和王有鑫, 2013)^[20]、产业集聚 (苏丹妮等, 2018)^[21] 等。其中, 与本文最相关的文献主要是关注企业管理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杨冕等 (2022)^[22] 发现自愿型环境规制在显著提升企业出口数量的同时, 有效改进了企业出口质量。

2. 出口多元化

现有研究表明, 多产品出口是当前我国出口的主要形式 (许明和李逸飞, 2020)^[23]。企业为获得出口竞争优势, 往往在多产品出口中采取成本竞争和质量竞争策略 (Eckel and Neary, 2010^[24]; Eckel et al., 2015^[25])。从影响因素来看, 除外部需求的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价格、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外 (钟腾龙和余森杰, 2020)^[26], 区域一体化水平、固定成本、经济规模等因素也在二元边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钱学锋和熊平, 2010^[27]; Manova, 2008^[28])。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到, 一方面, 较多文献探讨了内部控制的经济效应, 但相较于关注企业生产经营绩效, 鲜有文献将内部控制的经济效应拓展至出口层面, 并分析内部控制是否会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另一方面, 从影响企业出口的相关研究来看, 尽管这些文献已经注意到企业管理水平对其出口的影响, 但仍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对企业管理的衡量方法相对片面, 无法综合体现企业管理水平; 二是对企业管理变量的内生性处理上仍存在不足, 导致结果存疑。而本文基于“内控通知”这一准自然实验, 探讨了加强公司治理是否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这更好地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科学论证了加强公司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积极作用, 从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研发强度渠道

在公司内部, 企业研发支出受到管理层决策、管理体系等多因素的影响 (胡元木, 2012)^[29]。从管理层决策来说, 管理层薪酬考核体系往往与企业会计业绩密切相关。而企业研发存在前期投入资金大、研发周期长、研发风险高、研发收益缓慢等特点, 这使得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倾向 (刘运国和刘雯, 2007)^[30], 也就是管理层存在为规避风险, 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 从而选择削减研发支出的动机 (Dechow and Sloan, 1991)^[31]。从管理体系来说, 企业研发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涉及到项目选择、资金投入、成果转化、人员激励等多个环节。若管理体系繁杂, 流程协调不畅, 则会导致研发停滞、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出现 (王运陈, 2015)^[32], 进而导致创新无法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 造成研发强度逐步降低, 并最终在全球竞争中丧失竞争力。

而加强公司内部治理能够有效缓解管理层机会主义倾向, 实现研发投入的持续提升和创新成果的持续产出。一方面, 内部控制对公司内部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保证公司经营合法合规的情况下, 内部控制建立了更加严格的监督机制、

更大力度的惩罚措施、更加合理的权责划分体系。这使得研发创新存在的周期长、风险大等弊端得以被企业综合考量,避免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李万福和陈晖丽,2012)^[33]。另一方面,内部控制也推动了更加合理的内部激励机制的建设。合理的研发激励机制不仅能够保障研发人员得到合理的薪酬奖励。这必然会帮助企业持续进行研发,进而有助于创新成果的持续出现和企业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研发强度的提高将有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于出口产品来说,一方面,研发支出水平的增加不仅推动了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持续出现,而且以自动化和标准化生产带来的产品误差范围被极大缩小,这均实现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内部控制所推动的企业信息在企业间和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及时、客观、全面传递,也使得产品信息能够被客观获取,在此情形下,企业能够在产品的更新换代中占得先机,不断增强市场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推动此类产品专业化生产程度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也进一步得到增强(李捷瑜等,2018)^[34]。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1: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将提升企业研发强度,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

(二) 生产率渠道

在现代公司运营环境下,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内部代理问题是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因素。所谓内部代理问题,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若拥有所有权的委托人与拥有经营权的代理人目标不一致,则代理人存在着偏离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动机。除此之外,经营权的上下级分层也会导致代理问题的出现(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4)^[35]。经营权下层权力由上层委托,信息不对称使得上层无法及时有效地监督下级行为,下层无法及时获取上级任务目标。结果是部门协调不畅和决策滞后,公司生产经营效率无法达到最优,并进一步影响到公司的全球化战略。

内部控制对提高企业生产率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内部控制强调企业需要及时、准确地收集和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确保信息在企业内部以及企业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另一方面,根据内部控制要求,企业需要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需各司其职,明确各岗位业务范围,保证权责分配合理。结果是下级到上级信息的汇报和上级到下级决策的布局均能快速实现。因此,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司内部决策、管理、协调体系的逐步建立,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制度保障。

进一步,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张夏等,2020)^[36]。从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来说,为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取优势,企业需要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以降低生产成本,推动出口。在此过程中,公司需持续增加对机器设备的使用率以提升产品生产的自动化和标准化程度,从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品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结果是产品生产的自动化与标准化形成了对简单劳动的替代,降低了产品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熟练度、体力和习惯差异所带来的产品差异。产品良品率的不断攀升推动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为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2: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将提升企业生产率,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

（三）融资约束渠道

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是影响融资约束的重要原因（Fazzari and Athey, 1987）^[37]。从理论上说，上市公司会选择性披露对其有益的内部信息，这使得外部投资者难以获取公司完整真实的财务和内部管理信息，造成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为防止企业目标偏离自身期望，外部投资者往往采取更加保守的投资措施。结果是企业面临更高层次的融资约束。

内部控制能够带来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水平。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需要将内部控制相关信息与外部投资者、客户、债权人、监管部门等方面进行沟通和反馈。同时，企业也需要建立反舞弊机制，以防止信息方面的虚假问题。这使得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不断提升，外部投资者能够及时有效获取公司财务数据和经营信息，外部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也逐步降低。结果是公司融资成本不断降低，能够拥有充足的资金开展全球业务，推动产品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参与全球竞争。

而融资约束会显著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一方面，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的推进。在现金流不足与债务问题存在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着较强的资源约束。这使得其在降低风险投资的同时，优先将资金配置在债务偿还和日常运营当中，而非全球化战略的推进。这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较大的负向激励效应，成为限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客观瓶颈（Bernini et al., 2015）^[38]。另一方面，融资约束对中间品进口具有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Eck et al., 2015）^[39]。相较于国内采购，进口中间品需要企业付出更多的信息收集与分析、建立购买渠道等方面的固定成本。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难以获取到高质量中间品进口，进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受到抑制（孔祥贞等，2020）^[40]。为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3：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

三、研究设计

2012年，财政部与证监会联合发布“内控通知”，要求自2012年至2014年，所有主板上市公司应分类分批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且在披露年报时，需要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后称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细化来说，“内控通知”要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应当健全内部风险评估机制，梳理内部风险管控流程，完善公司经营管理制度，优化内部信息系统，建立员工绩效考评与内控责任挂钩机制，以推进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稳步实施。该通知旨在以建立强制性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保证经营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实现发展战略。

根据通知内容，强制性实施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和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应在2012年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并在披露2012年年报时，出具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第二阶段，2011年12月31日公司总市值（证监会算法）在50亿元以上，且2009年至2011年平均净利润在3000万

元以上的非国有上市公司应在披露 2013 年年报时,同时披露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第三阶段,其他主板上市公司,应在披露 2014 年公司年报的同时,披露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上述信息,“内控通知”的出台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试验。第一,该通知由财政部和证监会联合出台,相对外生于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第二,该通知确定了相对准确的实施时点;第三,该通知要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着手开展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建设,非主板上市公司则自愿实施。这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提供了良好的实验组与对照组。

(一) 模型构建

本文认为“内控通知”仅在 2012 年出台之初相对外生。理由如下:一方面,该通知出台时间存在一定的信号传递作用。理论上,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能够客观展现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提前实施内控规范体系,从而向市场传递自身治理良好的信息。这将激励非第一阶段披露报告的主板上市公司提前规范内部控制体系,并在 2012 年披露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张友棠和熊毅,2017)^[41]。另一方面,“内控通知”出台后,非第一阶段实施“内控”的主板上市公司能够准确预见到在未来两年内,自身须完成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构建。这为非第一阶段出具相关报告的主板上市公司提供了改善内部治理质量的动机。因此,通知在后续年份中不再满足外生性的要求。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

$$qua_{ifht} = \alpha_0 + \alpha_1 time_t \times treat_i + \beta \bar{X} + \mu_i + \gamma_i + \vartheta_h + \delta_f + \varepsilon_{ifht} \quad (1)$$

其中, i 代表企业; f 为出口目的国; h 表示 HS6 位码的产品, t 表示年份。 qua_{ifht}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i 在 t 年出口到 f 国 HS6 位码产品 h 的出口产品质量。 $time_t \times treat_i$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time_t$ 为年份虚拟变量,本文将 2012 年作为政策出台年份,年份大于等于 2012 年取 1,否则取 0。 $treat_i$ 是个体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为主板上市公司则取 1,除主板以外的中小板、创业板等上市公司取 0。 $\bar{X}$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资产周转率、资产收益率、第一大股东占比、两权分离率和行业集中度。 μ_i 、 γ_i 、 ϑ_h 和 δ_f 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产品固定效应和目的国固定效应。 ε_{ifht} 是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出口产品质量 qua_{ifht} 。本文参考 Fan 等 (2015) 和 Khandelwal 等 (2013)^[42] 的思路,从“年份—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测算 HS6 位码产品的出口产品质量,具体如下:

$$\ln q_{ifht} = \mu_{ft} - \sigma \ln p_{ifht} + \varphi_h + \varepsilon_{ifht} \quad (2)$$

其中, q_{iht} 为企业 i 在 t 年出口到 f 国 HS6 位码产品 h 的数量。 p_{iht} 为企业 i 在 t 年出口到 f 国 HS6 位码产品 h 的价格。 μ_{fi} 为“年份—目的国”固定效应; φ_h 为 HS6 位码产品层面固定效应; ε_{iht} 是扰动项, 其中包含了 HS6 位码产品层面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信息; σ 为产品间替代弹性。对上式进行估计即可获取扰动项的估计值 $\hat{\varepsilon}_{iht}$, 从而获取出口产品质量 qua_{iht} 。

$$qua_{iht} = \ln \lambda_{iht} = \frac{\hat{\varepsilon}_{iht}}{(\sigma - 1)} = \frac{\ln q_{iht} - \ln \hat{q}_{iht}}{(\sigma - 1)} \quad (3)$$

但对上述等式进行估计可能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忽略了地区间产品的多样性; 第二, 出口产品价格与数量存在内生性。为此, 本文参考苏丹妮等 (2018) 的思路: 第一, 对于忽略产品多样性的问题, 本文引入省级层面的 GDP 作为控制变量以代表产品多样性; 第二, 对于产品数量与价格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企业 i 在 t 年出口到除 f 国以外的 HS6 位码产品 h 的平均价格作为企业 i 在 t 年出口到 f 国 HS6 位码产品 h 价格的工具变量。除此之外, 本文采用 Broda 和 Weinstein (2006)^[43] 所提供的替代弹性来表示 σ 。

2.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资产周转率、资产收益率、第一大股东占比、两权分离率和行业集中度^①。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9—2015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所提供的中国出口企业海关备案码, 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同时, 为保证实证结果可靠, 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清洗: 第一, 剔除 2012 年以后上市的上市公司; 第二, 剔除已退市的上市公司; 第三, 剔除 ST、*ST 的上市公司; 第四, 剔除金融类、保险类上市公司。最终得到时间跨度为 2009—2015 年, 上市公司数量为 542 家的非平衡面板^②。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 第 (1) 列是控制了固定效应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 (2) 列是加入了各维度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根据第 (2) 列的回归结果, $time_i \times treat_i$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①限于篇幅, 变量解释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询”栏目查阅、下载。

②限于篇幅, 变量描述性统计查阅同前。

为保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操作：第一，选取 Broda 和 Weinstein（2006）所提供的美国进口替代弹性替换中国进口替代弹性，进而重新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回归结果如表 1 的第（3）列所示。第二，根据《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通知》，2011 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需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进行试点。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手工整理了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67 家公司，并剔除此类公司。回归结果如表 1 第（4）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均稳健。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time \times treat$	0.0175 ** (0.0072)	0.0390 *** (0.0081)	0.0705 *** (0.0202)	0.0451 *** (0.0083)
Constant	-0.0082 ** (0.0037)	-1.0080 *** (0.1786)	-1.4050 *** (0.4098)	-0.9506 *** (0.1808)
样本量	402 864	382 360	382 360	359 284
R ²	0.1263	0.1238	0.1231	0.1263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到“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若无特殊标注，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基准结果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即政策发生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并无显著差异。为此，本文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 1 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的基本结果。本文将政策发生前期作为基准组。由图可以看出，在“内控通知”出台前，回归系数基本趋向于 0，且置信区间也包含 0。而 2012 年“内控通知”出台后，回归系数发生显著提升，且置信区间不包含 0。这表明在政策发生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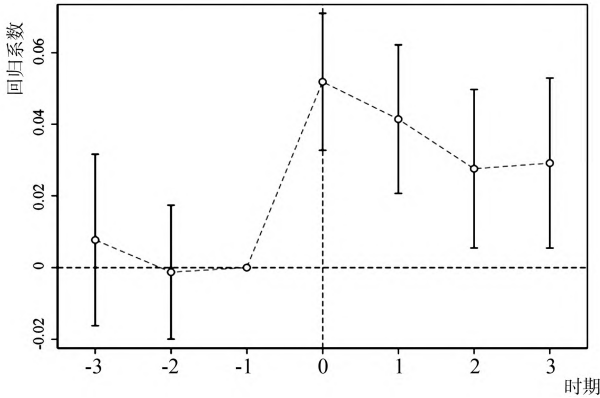


图 1 出口产品质量平行趋势检验

（三）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上述结果可能存在随机因素等影响，本部分进行安慰剂检验。参考 Li 等 (2016)^[44] 的思路，本文在沪深 A 股全部上市公司中随机生成受政策影响的实验组，该组样本数量与真实企业数量相同。与之同时，本文随机生成政策出台的年份。由此，本文生成了随机实验组 $false_treat_i$ 和随机外生政策时间 $false_time_i$ ，从而构造出随机“实验组—政策实施”试验。同时，为保证安慰剂检验的可靠性，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 500 次，并进一步绘制估计系数的密度分布图。安慰剂结果如图 2 所示。从估计系数的分布图来看，随机试验所得的估计系数集中在 0 附近，且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这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依旧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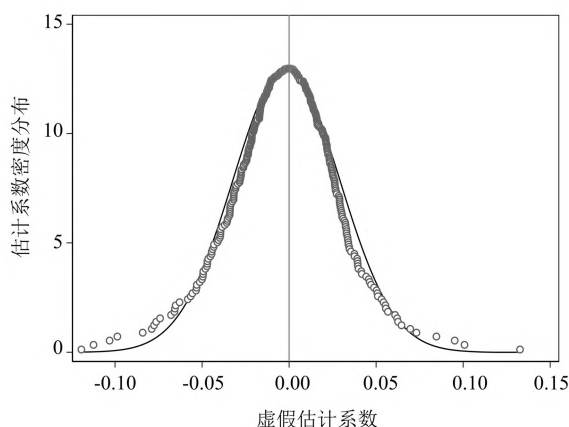


图 2 出口产品质量安慰剂检验

（四）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1. 控制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效应

自 2013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已经成立 21 个自贸试验区。为此，本文根据我国自贸试验区设置年份构建了自贸区虚拟变量 ftz_{pt} 。若 $ftz_{pt} = 1$ ，则表明省 p （自治区、直辖市）在 t 年设立成为自贸试验区。若 $ftz_{pt} = 0$ ，则表示在 t 年未设立自贸试验区。本文采取了两种方式控制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效应。第一，本文剔除了位于已成立自贸试验区的上市公司。第二，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了 ftz_{pt} 。基本结果如表 2 第（1）列和第（2）列所示， $time_t \times treat_i$ 的系数始终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加强公司内部治理稳健地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2. 控制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效应

本文参考卢盛峰等 (2021)^[45] 的思路，设置 39 个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城市并构建城市虚拟变量 $ydyl_i$ 。若上市公司位于“一带一路”核心城市，则 $ydyl_i = 1$ ，否则 $ydyl_i = 0$ 。同时，本文设定共建“一带一路”年份虚拟变量 $year_t$ 。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在 2013 年底提出，本文设置为：若年份为 2014 年及以后，则 $year_t = 1$ ，否则， $year_t = 0$ 。本文同样采取两种方式以控制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

效应。第一，本文剔除了位于 39 个核心城市的上市公司。第二，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城市虚拟变量和共建“一带一路”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ydyl_i \times year_i$ 。上述结果分别如表 2 的第 (3) 列和第 (4) 列所示，其中交互项的系数始终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本文的基本结果依旧稳健。

表 2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time \times treat$	0.0476 *** (0.0093)	0.0389 *** (0.0081)	0.0602 *** (0.0100)	0.0380 *** (0.0081)
ftz		0.0014 (0.0091)		
$ydyl$				0.0088 (0.00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1.0532 *** (0.1960)	-1.0090 *** (0.1788)	-1.9331 *** (0.2575)	-1.0037 *** (0.1787)
样本量	282 646	382 360	192 697	382 360
R ²	0.1397	0.1238	0.2094	0.1238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五) 异质性分析

1. 地区异质性

改革开放以来，从建立四大经济特区，到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再到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东部沿海地区始终走在对外开放的前沿。东部地区企业也在参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生产经营优势不断积累。为此，本部分考察所属地区差异是否会影响到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设置是否为东部地区企业的虚拟变量 $area$ 。若企业位于东部地区，则 $area = 1$ ，否则为 0。进一步将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互 ($time \times treat \times area$)，并加入到估计模型中。表 3 的第 (1) 列展示了基本估计结果。根据表 3，交互项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中西部地区企业受到政策影响的效果要显著大于东部地区。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东部地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时间较晚，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与之对应，内陆企业产品对接国际标准的时间可能较晚，因此产品质量提升的空间也更大。而伴随着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体制逐步优化，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均逐步提升。这使得内陆企业自身潜力得到极大的释放，产品质量快速提升。从而使得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在内陆企业层面更为显著。

2. 目的国异质性

从目的国视角来看，发达国家可能存在较为严苛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和监管体系，因此出口至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较为有限，难以对高质量产品生产所需的高成本进行支付，且其对产品质量和环保要求关注度较低，对产品质量并无较高要求。基于此，本文将目的国区分为是否是发达国家或经济体，以考察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设置目的国是否为

发达国家的虚拟变量 *advanced*。若目的国是发达国家，则 *advanced* = 1，否则为 0。同样，将目的国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互 ($time \times treat \times advanced$)，并加入到基准模型中。表 3 的第 (2) 列显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当中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对产品质量要求相对较低，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整体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使得企业逐步抛弃低质量产品的生产。结果是这种质量提升效应更易于反映在出口至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中，从而使得上述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

表 3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time \times treat$	0.0935 *** (0.0110)	0.0623 *** (0.0086)
$time \times treat \times area$	-0.0748 *** (0.0103)	
$time \times treat \times advanced$		-0.0658 *** (0.0091)
控制变量	是	是
<i>Constant</i>	-0.9916 *** (0.1785)	-0.9816 *** (0.1786)
样本量	382 360	382 360
R ²	0.1239	0.1240
固定效应	是	是

3. 行业异质性

不同的行业具备不同的特征。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以维持行业运行。这可能存在内部管理体系繁杂、信息传递不畅等问题。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往往需要持续性的研发投入和较高的研发强度以维持技术的持续更新。这使得本文更加关注于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是否存在行业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根据李雪冬等 (2018)^[46] 的划分标准，将制造业细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表 4 的第 (1) 列、第 (2) 列、第 (3) 列和第 (4) 列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 and 非制造业企业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显著提升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加强公司内部治理优化了企业内部管理体系，推动了生产流程和管理效率的持续优化，各个部门能够及时全面地将生产情况进行传递，推动了部门生产更加协调。这使得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将逐步建立并愈加成熟，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其生产结构中，技术占比较高，企业拥有较大的技术积累。而加强公司内部治理优化了企业研发体系，完善了创新激励机制。这使得企业内部技术研发力度不断提升，企业技术积累程度不断增加，从而带动产品质量不断升级。

表 4 行业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i>time × treat</i>	0.0568 * (0.0336)	0.0182 (0.0177)	0.0528 *** (0.0111)	0.0062 (0.017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0.7065 (1.3144)	-1.3246 ** (0.6302)	-2.5795 *** (0.2586)	0.1215 (0.3033)
样本量	38 373	52 863	175 020	116 069
R ²	0.1495	0.2775	0.2649	0.1344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六) 机制检验

前文的分析表明，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接下来，本部分进一步从研发强度、生产率和融资约束角度探讨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中间机制，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说 1—3。为此，本部分构建如下模型：

$$MEC = \alpha_0 + \alpha_1 time_i \times treat_i + \beta \vec{X}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MEC* 表示三个机制变量，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余变量的解释和上文相同。*MEC* 具体衡量指标如下：研发强度（ $\ln yf_{it}$ ）。本文参考李万福和陈晖丽（2012）的思路，采用企业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表示研发强度。本文使用对数形式。变量值越大，企业研发强度越高。生产率（ $\ln tfp_{it}$ ）。本文采用 LP 方法估算中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对数形式。变量值越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情况（ sa_{it} ）。KZ 指数值越大，则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表 5 展示了机制检验的基本结果。第（1）、（2）和（3）列分别是内部控制对研发强度、全要素生产率和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可见，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均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研发支出、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缓解了融资约束。因此，可以认为企业研发强度、生产率和融资约束是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三条重要渠道，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说得到验证。

表 5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i>time × treat</i>	0.8840 *** (0.1207)	0.0172 * (0.0102)	-0.4042 *** (0.136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i>Constant</i>	3.0934 * (1.7132)	-7.1662 *** (0.2525)	14.8944 *** (3.1527)
样本量	2 580	3 075	3 099
R ²	0.8082	0.9945	0.7843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五、拓展分析

本部分在上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是否会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产生影响。其中，本文对集约边际定义为“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的出口金额；拓展边际的定义为“企业—目的国”层面出口产品种类数和“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国家数。其中，产品定义为 HS6 位码层面的产品。表 6 的三列按顺序展示了上述二元边际的基本回归结果。

从第（1）列可以得到， $time_i \times treat_i$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显著提升了“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的产品出口金额。第（2）列 $time_i \times treat_i$ 的系数不显著，但第（3）列 $time_i \times treat_i$ 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显著拓展了同类产品多目的国的出口，但并没有显著增加企业对目的国产品种类数的出口。因此，加强企业内部治理不仅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对出口的二元边际具有积极意义。当前，如何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维护企业经营安全是我国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环。而加强公司内部治理通过提高质量和开拓市场，提升了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降低了单一市场风险。因此，加强公司治理业已成为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背景下，推动我国外贸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表 6 进一步分析

变量	(1)	(2)	(3)
$time \times treat$	0.1093 *** (0.0185)	0.0518 (0.0333)	0.0830 ** (0.036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Constant	4.9696 *** (0.3743)	-0.5354 (0.9088)	-0.6974 (1.1056)
样本量	481 379	116 655	135 895
R ²	0.6203	0.4755	0.334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产品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注：第（1）列括号内是聚类到“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2）、（3）列括号内是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内控通知”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影响机制。实证分析发现，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出口。此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从异质性来看，在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出

口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中,内部控制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来看,内部控制通过提高研发强度、提升生产率和缓解融资约束三条渠道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出口。在拓展分析中,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对出口的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金额和出口目的地数量。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和实现高质量出口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政策制定者可持续完善内部控制相关法律法规。一是,政策制定者可完善治理评估标准,将产品质量等内容纳入到评估体系,逐步建立起涉及采购、研发、生产、销售等在内的全流程质量监管体系,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出口。二是,政策制定者可分类分层细化内部控制细则。根据本文的结论,公司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研发强度提升、生产率提高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渠道实现。因此,政策制定者可针对企业在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层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在人才引进、创新激励及融资约束等方面给予支持,从而发挥出强化公司治理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出口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政策制定者可加强对企业内部风险和信息披露的监管与第三方评估,构建起预警企业名单并强化监测,以强化外部监管,实现企业内部治理水平的提升。

第二,企业管理者可将内部治理体系建设作为推动自身高质量出口的重要抓手。一是,企业应适应政策的出台,主动积极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升自身治理水平。尤其是在管控风险的同时,加强对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强化创新人才引进及激励力度,将创新纳入到公司发展战略层面,从而以内部治理水平提升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出口。二是,基于上市公司“内控通知”的出台,企业可科学制定发展战略和推动财务管理制度改革。一方面,以更加透明的企业财务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外部融资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以更加宏观科学的发展战略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实现高质量出口。

[参考文献]

- [1] 陈红,纳超洪,雨田木子,等.内部控制与研发补贴绩效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12):149-164.
- [2] 钟凯,吕洁,程小可.内部控制建设与企业创新投资:促进还是抑制?——中国“萨班斯”法案的经济后果[J].证券市场导报,2016(9):30-38.
- [3] DOYLE J T, GE W, MCVAY S. 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7, 82 (5): 1141-1170.
- [4] 方红星,金玉娜.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3(7):63-69,97.
- [5] 叶康涛,曹丰,王化成.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J].金融研究,2015(2):192-206.
- [6] DHALIWAL D, HOGAN C, TREZEVANT R, et al. Internal Control Disclosures, Monitoring, and the Cost of Debt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 86.
- [7] 单华军.内部控制、公司违规与监管绩效改进——来自2007—2008年深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140-148.
- [8] BARGERON L L, LEHN K M, ZUTTER C J. Sarbanes-oxley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49 (1): 34-52.
- [9] 张国清,马威伟.强制性、自愿性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吗?[J].会计研究,

- 2020 (7): 131-143.
- [10] 余明桂, 夏新平, 邹振松.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 [J]. 管理世界, 2006 (8): 104-112, 125, 172.
 - [11] 杨德明, 林斌, 王彦超. 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 [J]. 审计研究, 2009 (5): 74-81.
 - [12] BROCHET F. Information Content of Insider Trad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 (2): 419-446.
 - [13] 秦娜, 曾祥飞. 内部控制融资约束对企业 R&D 投资的影响 [J]. 统计与决策, 2018, 34 (3): 185-188.
 - [14] 郭檬楠, 李校红. 内部控制、社会审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协同监督抑或互相替代 [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0, 35 (11): 77-84.
 - [15] 施炳展.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 测度与事实 [J]. 经济学 (季刊), 2014, 13 (1): 263-284.
 - [16] 许家云, 毛其淋, 胡鞍钢.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中国证据的研究 [J]. 世界经济, 2017, 40 (3): 52-75.
 - [17] 樊海潮, 郭光远. 出口价格、出口质量与生产率间的关系: 中国的证据 [J]. 世界经济, 2015, 38 (2): 58-85.
 - [18] GROSSMAN G M, HELPMAN E. 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 (2): 557-586.
 - [19] FAN H, LI Y A, YEAPLE S R. Trade Liberalization, Quality, and Export Pric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 (5): 1033-1051.
 - [20] 李坤望, 王有鑫. FDI 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 GMM 方法的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3 (5): 60-66+89.
 - [21] 苏丹妮, 盛斌, 邵朝对.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11): 117-135.
 - [22] 杨晔, 王恩泽, 叶初升.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增量提质”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6): 155-173.
 - [23] 许明, 李逸飞. 最低工资政策、成本不完全传递与多产品加成率调整 [J]. 经济研究, 2020, 55 (4): 167-183.
 - [24] ECKEL C, NEARY J P. Multi-product Firms and Flexible Manufactu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0, 77 (1): 188-217.
 - [25] ECKEL C, IACOVONE L, JAVORCIK B, et al. Multi-product Firms at Home and Away: Cost- versus Quality-based Compete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5 (2): 216-232.
 - [26] 钟腾龙, 余森杰. 外部需求、竞争策略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0): 119-137.
 - [27] 钱学锋, 熊平.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 [J]. 经济研究, 2010, 45 (1): 65-79.
 - [28] MANOVA K. Credit Constraints, Equity Market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6 (1): 33-47.
 - [29] 胡元木. 技术独立董事可以提高 R&D 产出效率吗? ——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 15 (2): 136-142.
 - [30] 刘运国, 刘雯.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 R&D 支出 [J]. 管理世界, 2007 (1): 128-136.
 - [31] DECHOW P M, SLOAN R G. Executive Incentives and the Horizon Problem: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1, 14 (1): 51-89.
 - [32] 王运陈, 逮东, 宫义飞. 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了 R&D 效率吗? [J]. 证券市场导报, 2015 (1): 39-45.
 - [33] 李万福, 陈晖丽. 内部控制与公司实际税负 [J]. 金融研究, 2012 (9): 195-206.
 - [34] 李捷瑜, 李杰, 陈润深. 海外专利的双重创新效应研究: 过程创新还是产品创新?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 (3): 41-55+135.
 - [35] HOLMSTROM B, MILGROM P. The Firm as an Incentive System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 (4): 972-991.
 - [36] 张夏, 汪亚楠, 施炳展. 事实汇率制度、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J]. 世界经济, 2020, 43 (1): 170-192.
 - [37] FAZZARI S M, ATHEY M J. Asymmetric Informati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vestment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7, 69 (3): 481.

- [38] BERNINI M, GUILLOU S, BELLONE F. Financial Leverage and Export Quality: Evidence from France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5, 59 (C): 280-296.
- [39] ECK K, ENGEMANN M, SCHNITZER M. How Trade Credits Foster Exporting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5, 151 (1): 73-101.
- [40] 孔祥贞, 覃彬雍, 刘梓轩.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 (4): 17-29+135.
- [41] 张友棠, 熊毅. 内部控制、产权性质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基于2007~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J]. 审计研究, 2017 (3): 105-112.
- [42] 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WEI 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6): 2169-2195.
- [43] BRODA C, WEINSTEIN D E.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 (2): 541-585.
- [44] LI P, LU Y,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3: 18-37.
- [45] 卢盛峰, 董如玉, 叶初升.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高质量出口吗——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3): 80-98.
- [46] 李雪冬, 江可申, 夏海力. 供给侧改革引领下双三角异质性制造业要素扭曲及生产率比较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 (5): 23-39.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High-quality Expor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ZHANG Ying BAO Bingpeng FU Dahai

Abstract: Can strengthen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 exports? Addressing this question helps clarify the internal drivers of China's high-quality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at the micro level. Using matched export data from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and customs records (2009-2015), this study exploits *The 2012 Notice on the Classified and Batc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System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by Main Board Listed Compan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i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causal impact of improved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high-quality exports and to identify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onger corporate governanc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with more pronounced effects for firm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labor-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export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governance improvements boost export quality by increasing R&D intensity, enhancing productivity, and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Further analysis confirms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also positively influences both the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of export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high-quality exports, and also offers policy insight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xport development at the firm level in China.

Key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 Internal Control; Export Product Quality; High Quality Export

(责任编辑 白光)